

秦 裕 ■ 著

忏悔

与

虔诚

——
论道德真诚

上海三联书店

忏悔与虔诚 ——论道德真诚

秦 裕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朱国安

封面设计 桑吉芳

忏悔与虔诚

——论道德真诚

秦 裕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插页: 字数:113000

印数:1—2000

ISBN 7—5426—0817—7/B·68

定价:7.20 元

论道德真诚(代绪论)

道德上“伪君子”和“假道学”最基本的特征是虚假和伪善。正如《辞海》所定义的那样,这种人是“假装好人以欺世盗名”,是“假充好人;假冒为善”。“心口不一”和“言行不一”是这类人的具体表现。所谓“心口不一”,是指他们表面上所说的话与内心的真正信仰完全相反。他们可以用尽冠冕堂皇的口号和漂亮诱人的道德词藻,但内心深处却没有丝毫的认同。这样,也就导致了他们的“言行不一”。在这些人的实际行为中,是不会体现他们所宣称的道德口号的。即使有时为了假冒为善和假充好人,不得不做一些善事,那也不是他们所心甘情愿的。

从理论上讲,任何道德一旦系统化、规范化和仪式化之后,就有产生“伪君子”和“假道学”的可能。因为,道德的这种形式主义特征,往往成为这些人达到个人私欲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本意并非是为了实践道德义务,而仅仅是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善”名,以此来欺世盗名、获得私欲,来掩饰自己的丑恶行径和灵魂。这样,也就成为借仁义之名而行贪利之实的伪

君子。例如，在中国的历史上，“举孝廉”曾经成为一种道德政治制度。即把那些天下公认的“孝子”举荐做官。由此，就有某些所谓的“孝子”，并非出于真正的“孝”德，而是为了做官而行孝。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这种在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者被称为法利塞人信仰和习惯(Pharisaism, 中文直接译成伪善)。这些人标榜自己墨守宗教制度和传统习惯，但这种虔诚并非出自他们真实的内心要求，而是一种虚伪的和假冒的虔诚。所以，这种人总是将善事做在人们面前，如故意站在十字路口或会堂里祷告，故意在禁食时脸上带着愁容，以便让人看见、让人知道。甚至为了拘泥于“遵守安息日”的规定，他们指责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由此，耶稣直接了当地斥责他们是一群伪君子。认为他们只是在人面前、在外面显示出正义来，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相反，只有用心灵和诚实来对待宗教，才是真正的。

确实，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伪君子”和“假道学”是对道德的最大破坏。一种道德，无论如何美好，如果是通过“伪君子”和“假道学”之口说出来的话，就会使人产生厌恶和反感，就会使道德丧失威信。这就好比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本来，货币的最主要特征是要人们无条件地信任它，从而使直接的物物交换能够通过货币这一中介而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如果人们忽然发现流通中有假币存在的话，就会对整个货币制度产生怀疑。

“文革”之后出现的信仰危机或道德价值方针的失落，与人们对以往道德虚伪性的认识和反思，以及对真诚的呼唤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在这场劫难中，我们都曾经被虚假和伪

善欺骗过，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在贩卖谎言；但同时我们自己也戴过各种假面具，并或多或少地扮演过“伪君子”和“假道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金所写的《随想录》已超越了文学的价值，这是一部现代中国的《忏悔录》。是巴金作为思想家，作为一位真诚的老人所叙述的肺腑之言。当他用笔在解剖自己灵魂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替我们社会所有的人在进行忏悔，其用意就是要找回“真诚”这一美德。

道德总是实践的。一个社会的现实道德，是人们实际所履行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人们口头上的一种表白。“伪君子”和“假道学”的存在，恰恰是对道德的反动，是道德堕落的标志。

二

在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一大批思想家，如鲁迅、陈独秀、吴虞等人，对儒家道德虚伪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伪君子”和“假道学”作了猛烈的批判。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中国的历史到处都充斥了“仁义道德”的宣传，但从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却是“吃人”二字。正是在一套规范化、仪式化的儒家道德熏陶下，有一大批道德上的虚伪者。他们“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还对这种“伪君子”的狰狞面目作了形象的刻画，他说：“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毛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

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同上)所以,陈独秀要痛心疾首地说:
“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

无论如何,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对儒家封建道德虚伪性的批判,是最为彻底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偏激和误解。封建统治阶级把儒家道德作为统治工具,当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伪善性。但是,它与儒家道德理论本身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事实上,儒家对道德中的“诚”有相当的重视。对此,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加以全盘否定。有必要弘扬传统道德的积极方面,以作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借鉴。

儒家道德是从“天人合一”的模式出发,从“天道”所具有的“诚”引伸出“人道”,也应该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由此,把“至诚”看成完美人格的最终归宿(“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并认为只有诚才能感染人、打动人(“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也只有诚,才使道德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儒家对“诚”的方法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即把“中庸之道”看成是诚在道德中的具体运用。过去,学术界往往把中庸作为儒家道德的糟粕和消极方面来加以批判的。中庸似乎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惰性和劣根性的根源,是一种调和矛盾、因循守旧的处世公约和立身方法。这一观点尚缺乏对中庸内涵的深入分析。“中庸”意味着执两用中,即在履行道德规范时,既不要“过之”,也不要“不及”。如果是“不及”,没有达到道德规范的要求,这当然是一种不诚。但是,反过来像法利塞人那样极为苛刻地墨守于规范、拘泥于准则,表面上似乎很诚心地在履行道德,实际上却往往走向道德的反面,忘却规

范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实质而陷入就规范而规范的极端性中，成为道德上的“唱高调者”，它同样是一种不诚。所以，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并把“中庸”当作最高的道德境界。正如《中庸》篇中所说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巴金在《随想录》中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同样揭示了这个道理。他认为“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就越不漂亮”。

三

与“伪君子”和“假道学”相对立的是道德上的真诚。虔诚式真诚是真诚的肯定性形式。它一般包含三个要素：其一，必须有某种能为之真诚的事业和对象(cause 或 object)。当我们说真诚的时候，并非在抽象意义上说的，总是相对于某种值得人们真诚的对象而说的。你意识到这种对象的存在，并认同这种对象。例如，相对于宗教的真诚，是一套宗教的教义和教规；而世俗道德的真诚，则是具体的道德规范。其二，作为真诚的对象，仅仅认同是不够的，它是你的全部信仰。信仰就意味着你承认它、选择它，并真心实意地为这种对象而献身。其三，真诚总是实践的，它是通过个人的行动来表现自己对这种对象的选择和信仰。

不能否认，“文革”初期红卫兵的真诚是虔诚式的。他们有非常崇高的事业，即真诚的对象，并力图以自己的全部行动和实践来体现这种真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为之献出年轻的真诚和重负的朝圣的年代。然而，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这种虔诚式的真诚却遭到普遍的责难。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似乎也否定了这样的虔诚。我们无法回避当时那种真诚

确实有其缺陷，即与个人的崇拜相联系，从而流于盲从。

但是，这种个体理性的丧失并不能由此反对虔诚式真诚本身。事实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需要这种虔诚式真诚。特别是当民族面临危难存亡时，更需如此，它起着道德凝聚力的作用。例如，在战争中，正是出于爱国主义的虔诚式真诚，才使无数战士做出英雄壮举。同样，今天的经济改革，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虔诚式真诚来作为民族的精神动力，促使我们的经济腾飞。德国哲学家克洛纳曾这样认为：“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东西，一切有价值、有效准的东西，都具有精神的本性。”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对于自己民族精神（理念）的虔诚，使他们在战败后能迅速地重建家园。这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今天的虔诚式真诚必须克服过去的缺陷，必须带有自己强烈的理性思考，而不能成为一种“精神胡话”。

四

忏悔式真诚是另一种形式的真诚。这种真诚的特点在于有勇气承认人们通常不愿或不敢承认的东西。它具体表现为“怎么想就怎么说，做了什么就承认什么”。这也是一种“心口如一”和“言行一致”，与“伪君子”和“假道学”相对立。因为，对于那些“伪君子”和“假道学”来说，是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所“想”或所“做”的。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奥古斯汀和卢梭的《忏悔录》是这样一种真诚。而巴金的《随想录》更是这种真诚。本来，巴金自己也是这场劫难的受害者，但他仍然深深地谴责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这就是忏悔式真诚的勇气。巴金自己也说

“卢骚(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忏悔式真诚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不断成熟、不断前进的标志。揭露丑陋,忏悔过错,并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它恰恰能成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文革”之后,正是这种忏悔式真诚,作为一种反思的勇气和批判的力量,才使得我们在现实的道德领域中清除虚假和伪善。否则,我们将处于假象和迷惑之中。

不过,在一部分人之中,特别是某些青年,使这种忏悔式真诚趋向极端。他们把这种“真诚”当作时髦和托词,从而为自己的任意妄为进行辩护。他们的思想、行为和语言可以与社会道德格格不入;可以放荡不羁、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接受“痞子道德”的指责;但他们仍然无所谓,很坦然,因为,他们恰恰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所做所为,而决不掩饰、不遮盖、不羞羞答答。于是,他们会非常自豪地说:“我很真诚”。而所有“越轨”行为也在“真诚”这一托词下得到了解脱。相反,他们还会指责那些表面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人很虚伪。我们可以从当代的新潮小说(如王朔《顽主》中的主人公)看到这种极端化真诚的典型。

这是一种颠倒的真诚,已经走向了真诚的反面,变为一种真正的不诚。事实上,无论是虔诚式还是忏悔式真诚,都是与道德标准相联系的,都要经过人的认知和理性的参与。否则,真诚就成为一种虚妄。对于虔诚式真诚来说,如果缺乏理性的和道德的标准,就会陷入盲从,导致类似“文革”中的悲剧。同样,如果忏悔式真诚没有标准的话,就会沦为玩世不恭和为所欲为。

事实上,忏悔式真诚的目的是为了否定过去、鞭策现在、

不断前进，一旦停留在对事实的坦然认可和对行为的“借口”中时，也就失去了忏悔式真诚的意义。

五

确立真诚的道德氛围，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们自己必须是道德上的真诚者，以自己的行动和实践来证明自己所倡导和要求的道德规范。而不能是单纯的唱高调者，更不应该是那种“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的道德说教家。在这一方面，周恩来是我们所有干部的学习榜样。他胸前所佩带的“为人民服务”徽章，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标志，而且是他的全部信念和实践的归宿。

其次，对于所有道德理论研究和宣传者来说，必须时刻反省自己，培养自己的高尚人格，做到“言行一致”和“心口如一”，警惕自己沦为一种“伪君子”和“假道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育人、感动人和带动人；否则，将导致被教育者的逆反心理。著名哲学家冯契教授有句话对我们很有启迪，这就是要“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它要求我们将学问和人品、学术研究和理想人格的追求紧密地融合起来。

最后，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应该追求一种道德真诚，造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气氛。要向鲁迅和巴金学习，以真诚的态度检讨自己的行为。同时，要消除一种“从众心理”，不要把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现象作为自己“虚假”的借口，应该发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

• 此文曾于1992年5月29日全文发表于《文汇报》的论苑版上。

目 录

绪 论： 论道德真诚	(1)
第一章： 当代道德的危机——“伪君子”和“假道学” ...	(1)
1.1 “法利塞人”的祷告——“伪君子”及其特征	(2)
1.2 “智者”的职业和知识的异化—— “伪君子”的实质	(7)
1.3 格老康的故事和康德的比喻—— 道德的形式和内蕴	(16)
1.4 “假币恐慌症”——“伪君子”的危害	(44)
第二章： 当代道德重建的契机——探寻“真诚”	(51)
2.1 道德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	(52)
2.2 真诚的正向型方式——虔诚	(61)
2.3 真诚的逆向型方式——忏悔	(74)
第三章： “真诚”的操作方式——“中道”和“中庸”	(81)
3.1 “中道”与“德性”——亚里斯多德 对“真诚”的探讨	(82)
3.2 “中庸”与“诚”——中国哲学的探讨	(87)

3.3“中道”和“中庸”范畴的比较·····	(92)
第四章： 作为托辞和时髦的忏悔式真诚——	
现代真诚的误区 ·····	(95)
4.1 游戏规则和道德价值 ·····	(96)
4.2 人与所扮演的“角色”——	
“真诚”可能吗? ·····	(101)
4.3 现代社会的忏悔式真诚及其流弊 ·····	(110)
第五章： 心灵的操练——道德真诚的培养 ·····	(119)
5.1 西方伦理思潮的影响和伦理生活	
模式的探寻·····	(120)
5.2 现代社会中“智慧”的沦丧和“智慧学” ·····	(131)
5.3 道德教育的手段——语言和实践 ·····	(139)
后 记 ·····	(148)

第一章：当代道德的危机——

“伪君子”和“假道学”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摘自北岛《履历》

虚假和伪善是道德上“伪君子”及“假道学”的最基本特征。《辞海》曾为此下过这样的定义：这些人是“假装好人以欺世盗名”，是“假充好人；假冒伪善”。我们在《圣经》中的法利塞人那里，可以找到这种“伪君子”和“假道学”的典型形象。

1.1 “法利塞人”的祷告 ——“伪君子”及其特征

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这种“伪善”和“虚伪”被称之为法利塞人的信仰和习惯，其英文中 Pharisaism，也可以译成拘泥于形式的伪善。

《圣经》详细描述了此类人的特征。他们对于宗教的仪式和禁律有近乎苛板的虔诚，对于安息日，他们强调必须严格加以遵守，在这一天，不允许做任何事情。然而，耶稣却在这一天给人看医治病，于是，法利塞人认定耶稣是个罪人，断定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只有罪人才不守安息日。

对于饭前洗手，法利塞人也一再指责耶稣的门徒，质问：“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同样，在对禁食的态度上，法利塞人也曾质问：“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塞人看见了，痛心疾首地说：“你们作了安息日不可作的事情。法利塞人自己却在禁食时，故意将脸弄得十分难看，总是带着愁容，以便使人知道他们在禁食。”

这种行为方式还表现在法利塞人的祷告和行善事上。他们在行祷告时，总是站在十字路口上，有意要叫人看见，以表

示自己的虔诚。同时，他们在行善事时，总是喜欢做在人们的面前，以便让人们看见。

凡此种种，都力图想要表现法利塞人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但是，耶稣却认为，这种虔诚是一种流于形式的虔诚，仅仅局限于宗教生活的表面和规章制度的本身，恰恰是一种虚伪和伪善的表现。

耶稣有许多精彩的论断表明了他对这种假冒伪善的虔诚的看法。针对饭前洗手这个问题，耶稣反指责他们说：凡是从外面进入人里面的东西，不能污秽人。惟有从人里面出来的东西，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言、骄傲、狂妄等，这是从里面发生并能污秽人的东西。

关于遵守安息日的问题，耶稣曾这样反问法利塞人，你们口口声声说不能在安息日做任何其它的事，但是，你们中间，谁有羊、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而不立时拉它上来呢？既然你们能做这样的事，又为什么不许在安息日行善呢？在行善和行恶、救命和害命之间，究竟怎样才是对的呢？

耶稣这样教训门徒，叫他们在禁食时，要梳头洗脸，以便不要叫人看见你是在禁食。行善也不要故意让人看见，故意表现自己，以使他人尴尬。耶稣把法利塞人比喻成一座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他们只是洗净了杯子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他们只看见他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归纳起来，耶稣反对的是法利塞人的虚假的虔诚，拘泥于宗教制度和传统习惯的虔诚，一种假冒伪善的虔诚。因为，这种虔诚和信仰，恰恰是伪善者、假道学的行为方式；他们是外

表上的虔诚者，内心却没有一点点真实的虔诚。什么是真正的虔诚，耶稣认为这是对神的心灵和诚实的崇拜。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里所说的“父”，就是神。耶稣又宣讲说：“凡称呼我主阿主呵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事实上，《圣经》在许多地方都通过先知传达了神的一种启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赠祭”。也许，这是《圣经》中宗教式虔诚的真正意蕴。而法利塞人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伪君子 and 假道学。

如果要描述一下法利塞人的虚伪，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他们总是在人面前，在外面显出公义来，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正因为他们的“善”是假冒的，所以，他们是能说不做，由此，也使得他们总是把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个手指头，行一点善事。鉴于此，耶稣对法利塞人的态度比较严厉。在《圣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有时，甚至是愤怒地痛斥。

“伪君子”和“假道学”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他们的本质特征却只有一个，即“心口不一”和“言行不一”。所谓“心口不一”，是指他们表面上所说的话与内心的真正信仰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可以用尽冠冕堂皇的口号和漂亮诱人的道德词藻，但在内心深处却可以没有丝毫的认同。所以，他们就存在着表里不符的状况。

这种“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本质特征，必然使伪君子 and “假道学”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所谓“虔诚”。越是虚伪者，往往越是表现出一种对规范、教条和信念的“苛守”。通过这种“假面具”来掩盖自我人格背离的恐慌。从“法